

# 從邂逅到「山」盟「海」誓：台灣原住民 文化傳播變遷的探討

連慧珠\*

## 摘 要

原住民不同的社會型態，分別在其部落社會中發展出極其獨特而有別於漢人社會的藝術與文化，一直以來，往往被框架在「載歌載舞」的表現形式文化想像中，在漢人的優勢文化挾帶「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原住民文化往往遭扭曲而被邊緣化。本文透過原住民在漫長的台灣發展史裡，以包容、海納不同文化觀點的個性，在不同時代裡如何與主體的漢族文化共同生存。

**關鍵詞：**原住民、平埔族、高砂族、山地人

---

\* 連慧珠，彰化建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電子郵件：hueichu@ctu.edu.tw。

## 一、前言：邁向包容與開闊性的原住民文化傳播

台灣原住民<sup>1</sup>大致上區分成高山族與平埔族。顧名思義，高山族居住的地區大多位於台灣的山林地帶，而平埔族則生活於海岸平原、盆地區。從17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台灣是外來政權出入頻繁的地方，對原住民的傳統生態與文化造成極大的衝擊，現今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社會，對於公共議題行使多數決投票方式解決，但民主的素養乃「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目前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人口資料顯示，原住民總人口數為504,531人，僅占今日全台總人口數2.1%，原住民雖是少數民族，卻分布在台灣三分之二的土地上，族群數量至少超過原委會公佈的14族，各族均有其獨特而深具特色之文化，是故「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實踐，應建立於對原住民社會文化的認識、理解與尊重以落實。

原住民不同的社會型態，分別在其部落社會中發展出極其獨特而有別於漢人社會的藝術與文化，一直以來，往往被框架在「載歌載舞」的表現形式文化想像中，在漢人的優勢文化挾帶「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原住民文化往往遭扭曲而被邊緣化，然而台灣的地理環境四面環海、三分之二為山林，是以原住民文化的社會體系中，優秀的漁人與獵人的訓練以及相關的海洋與山林的知識體系，乃為其個別獨立的社會文化體系的內涵，但往往不易為以農業文化為主的漢人所理解，且造成一定程度的誤解，是以了解原住民文化以達到溝通與文化傳播的公義目的，是目前台灣多元文化訴求過程中，文化學習、交流的重要課題。

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由於未建立文字書寫系統，故原住民文化傳播的方式多透過漢人以及日本人類學者調查、研究而予以表述出來。從日人的理蕃

---

<sup>1</sup> 1994年4月10日，在「原住民文化會議」中，李登輝首次代表官方以「原住民族」一詞取代以往對土著的稱呼；同年，憲法將「山胞」修正為「原住民」。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將台灣各原住民族稱為「原住民」，此後並為官方與民間共同使用的稱謂原則。

政策下的各式各樣的人類學者、警察、職員的報導紀錄中，原住民文化被凸顯其政府文明統治下的被征服者之「落後性」、「野蠻性」，即便是戰後國民黨政府統治的台灣，依然以「山地平地化」政策，延續日人理蕃政策管理原住民，是故反映在報導上，多為原住民社會習慣、民俗藝術獵奇、采風與官方同化政策推動之報導性內容。

80年代，湯英伸事件、童工、礦工、雛妓、核廢料掩埋場等事件暴露原住民在憲法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矛盾，隨著解嚴與解除報禁而為各式各樣的報刊所批露與形成社會關懷，原住民透過文學作品、或在各報章雜誌發表文章，為少數民族爭取生存權與文化權，原住民族更開始在自辦的刊物上凸顯凝聚身份與文化認同、團結自救的努力，進而逐步從漢人手中獲致文化解釋權。80年代可說是原住民透過組織與報刊，發展傳播身份、文化認同等主體性認同的關鍵性年代，或可謂台灣邁向原住民文化傳播的包容、多元與開闊性年代。

## 二、描述邂逅：蕃族、高砂族、山地人的報導

傳播、溝通的工具（語言、文字）乃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於台灣原住民族過去並未建立文字系統，故透過口傳方式，而以儀式、圖騰、地景等符號為媒介，代代傳承其傳統文化知識體系，成為部落社會內部凝聚力、團結的基石，然而在18世紀中葉，台灣社會逐漸轉型為漢人移民社會<sup>2</sup>，而文字透過印刷術大量將訊息傳播，文字做為一強大的傳播方式，透過帝國官僚組織有效地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漢文化觀點，落實在「土牛紅線」<sup>3</sup>作為漢、番關係的管理方針，強調「華」、「夷」之防，於是形成漢文化由上而下、經由貿易活動與教育的傳播方式主導了文化的傳播，然而漢、番衝突不斷仍為

<sup>2</sup>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1987）。

<sup>3</sup> 參見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卷2期，1989，頁95-98。

終清代以來的原、漢關係主軸。

1895年日、清戰爭後，台灣在馬關條約下主權轉移予日本，日人初以無方針主義、漸進政策治理台灣，故進行全台土地、林野、人口、民俗舊慣等各項資源調查，從而自台灣的各種豐富的經濟資源中，建立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基礎。由於深具高經濟價值的林木多位於原住民生活區域內，故而在總督府的支持下，人種、土俗調查豐富與多樣的研究成為人類學者的天堂，1898年，臺灣總督府的官僚與時對原住民、山地研究有興趣的學者組成「蕃情研究會」，並創刊發行其機關誌《蕃情研究會誌》，內容多為有關臺灣原住民生活習慣及風俗民情之調查研究資料與論文。其次為「生蕃研究會」之機關雜誌《蕃界》，主要為研究「生蕃」原住民的調查報導。1931年，移川子之藏設立「南方土俗學會」並創刊《南方土俗》雜誌，成為考古學、人類學方面的喉舌，該雜誌主要為學術園地。另有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輯的《理蕃之友》，大部分的文稿都出之於警務系統的高官和理蕃單位的警官，間亦有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的專文、民間學者的或擔任日警的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意見表達等，透過該雜誌交流理蕃經驗。日本人新近才為其位於北海道唯一的原住民愛努族正名，是以過去日人大多以國境之南獵奇、土俗描述、報導蕃族<sup>4</sup>、或是宣傳理蕃成果與教化成就，最終仍是為遂其經濟目標以達同化政策之目的。

日本去台後，國民黨政府仍延續其理蕃政策，對原住民推行「新生活運動」與「山地平地化運動」，依然以同化為治理政策，1950年起，國民政府推行「山地三大運動」--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定耕農業、育苗造林，欲改變山地的經濟結構，使其平地化，同時將山地經濟整合至台灣經濟結構中。結果卻造就了土地流失、雛妓販賣、原住民淪為都市叢林打零工、淪為船員或礦工、甚而發生蘭嶼核廢料掩埋衍生的生存權問題。

少數民族的問題在70年代初期的國際社會裡，國際社會秩序出現了第四

---

<sup>4</sup> 日文中的「番」字另有其字義，故使用「蕃」。

世界（the fourth world）挑戰傳統世界架構，George Manuel則率先於1974年將少數民族與原住民與第四世界關聯起來，使「原住民」比「少數民族」更直接可以被了解或把握的概念或對象，同時有種將原住民族事務提升至國際主體政治實體相對等的象徵作用<sup>5</sup>。然而台灣此時處於戒嚴時期，同時退出聯合國，政府為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反制文化大革命，少數民族遂成為仁義教化的對象；「吳鳳的故事」便是顯而易見的例子。

在「山地平地化」的同化政策過程中，「吳鳳的故事」被建構出來後，逐漸成為家戶喻曉的成仁取義之原、漢互動的教化題材，甚至成為小學「生活與倫理」課本的教材。這樣的內容源自於日本人統治台灣時所進行林野土地資源調查，而發展出吳鳳的傳說，明顯地代表外來力量，為了土地資源的再調整分配而產生族群的衝突，吳鳳為捍衛移墾漢人而被殺，在漢文化為主體的統治政權時代，因而被發揚光大為成仁取義的神話，「吳鳳的故事」放在小學課本中，是義務教育過程中的每位學童必須閱讀的文章，強而有利地反覆界定著漢與番、優越與低劣、統治者與被馴服者、文明與野蠻、道德與墮落；該故事指涉的阿里山鄒族卻是看了這故事才知道有吳鳳其人，不但故事本身起了傳播的功能，而這個故事的報導者、講述者卻也一直扮演著族群分化的推手角色。

### 三、山盟海誓：轉捩點的80年代

做為「成仁取義」的民族英雄，在80年代的台灣，開始了族群問題的反思，事實上，吳鳳故事裡充滿了矛盾與荒謬，台灣原住民中多數高山族有獵首的傳統，此一社會習慣應在特定的社會文化體系中解釋；然而卻說做為通事的吳鳳為了使有獵首社會習慣的原住民移風易俗，允諾以40個骷髏一年一個作為祭神用，「如果死人的骨頭可以用做犧牲，那麼人類學的宗教理論也

---

<sup>5</sup> 謝世忠，《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台灣原住民論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4。

可以改編了，山胞們也就不必煞費周章地到處要『獵』人頭，只要做個竊墓者便可享用不盡了。」<sup>6</sup>儘管透過部份漢人學者的反思，原住民被觀察、被書寫，在異文化式的同情與反省中，作為少數民族的原住民在80年代初雖然成為被討論、研究的對象，但仍只是「他者」(others)。

不但如此，吳鳳的故事不斷還深化著社會矛盾與對立，統治者藉由吳鳳感化鄒族的仁義之舉，藉以向被統治的弱勢少數民族提出認同的典範，再以獵首逕自解釋為野蠻行為，同時深化對原住民文化偏見與歧視，不但製造平地漢人對原住民獵人的負面印象，甚至使傳統上沒有獵首習慣的其他原住民族與之產生隔閡，長期分化著社會內部，關於吳鳳「這則神話的象徵意涵中，漢人背負了『大漢沙文主義』的罪名，使台灣早期歷史上曾發生的漢、番衝突問題，不但沒有隨時光而化解，反而因為執政者和文化界對吳鳳精神的宣揚（例如編寫教材、舞蹈、豎立銅像、耗資數億興建吳鳳紀念館、舉行祭典活動等），進一步強化族群間的衝突意識，分化台灣各族群間的團結性，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潛在矛盾，阻礙了和諧與正義的建立。」<sup>7</sup> 198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社會走向民主化，各種爭取弱勢族群權益的社會運動大量興起，同時社會變遷中不少少數民族的知識青年受到新知啟沃，逐漸發展民族身份認同意識。由於擁有媒體便擁有族群關係的解釋權，原住民社會文化往往在被報導過程中被扭曲、甚至被消遣，在《中國時報》一篇社會新聞的報導中，「山地響馬北上混江湖、搶劫計程得款餵酒蟲」<sup>8</sup>，飲酒其實和人類文明一樣久遠，而原住民過去飲酒總是與宗教祭儀、婚喪喜慶、和歌唱舞蹈等藝術想像等集體活動關聯，但是山地酗酒問題，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說道：「50年代始，省公賣局始以劣質太白酒等傾銷原住民部落，在部落迅速而全面崩盤的同時，酒類正好麻痺了部落因弱勢而逐漸喪失的尊嚴，同時也填補了因

---

<sup>6</sup> 陳其南，〈文化、結構與神話〉，《民生報》，1980.7.28。

<sup>7</sup> 黃美英，〈吳鳳神話象徵的瓦解〉，《文化的抗爭與儀式》（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48。

<sup>8</sup> 《中國時報》，1984.3.1。

傳統道德瓦解後的空虛。」<sup>9</sup>卑南族孫大川則認為乃應從「原始生命力」的扭曲與喪失之脈絡來探討，並以原住民近百年的文化、社會、生存空間的經驗乃是「朝向死亡」的經驗，說明「『死亡』的壓力，迫使原住民將其生命力扭曲、消散到自我毀滅的道路上。這才是山地酗酒問題最恐怖的根源。」<sup>10</sup>而傳播媒體乃以「華夷之防」的觀點，原住民被構想成文化落後、民風剽悍，實際上已嚴重扭曲、傷害原住民人格，甚至廉價地消費原住民文化。

為擁文化解釋權，實現民主政治的平等基礎，凝聚原住民身份認同的原住民社團產生，原住民並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且開始創辦刊物。1983年台灣大學學生夷將·拔路兒、伊凡·諾幹、林宏東、楊志航等人創辦《高山青》雜誌，專題中以「我們必須要說--台灣高山族正面臨種族滅亡的重大危機」<sup>11</sup>，第二期更針對「吳鳳捨生取義的故事」發表：「曹（鄒）族同胞說—吳鳳是我們殺的，因為他是奸商」<sup>12</sup>，講出了一個與國小課本不同的「吳鳳的故事」，重述歷史、取得歷史解釋權，從而刺激原住民運動的興起。人類學者認為「『反吳鳳運動』實際上類似反污染反公害的自力救濟行動」透過民間集體抗爭儀式，使人們朝向建構一個新的社會形成（social formation）。<sup>13</sup>

1984年「少數民族委員會」成立，並印製會報〈台灣高山族的吶喊〉，強調憲法精神的落實：「各民族一律平等」<sup>14</sup>，同時出版《為山地而歌》主張「相互尊重各族之間的生活權、文化權，絕對比『同化』更能使國家強大，亦絕對比『同化』更能使社會更趨幸福與和諧」<sup>15</sup>。是年年底，台灣第一個由原住民自己辦的社團「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發刊《原住民》

<sup>9</sup> 瓦歷斯·諾幹，〈部落與酒〉，《民眾日報》，1988.2.29。

<sup>10</sup> 孫大川，〈久久酒一次之二〉，《首都早報》，1989.9.30。

<sup>11</sup> 《高山青》創刊號，收入夷將·拔路兒等編著，《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2008），頁28。

<sup>12</sup> 《高山青》第2期，收入夷將·拔路兒等編著，《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頁35。

<sup>13</sup> 黃美英，〈展開符號與儀式的抗爭運動—瓦解權力的象徵〉，《首都早報》，1989.7.4。

<sup>14</sup>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少數民族委員會印製，〈台灣高山族的吶喊〉，1984.6.24。

<sup>15</sup> 蘇拉滿·阿勒，〈尊重而非同化、平等而不壓迫—依個高山族青年的呼籲〉，《為山地而歌》，1984.6，頁1。

會訊，此後「原住民」這個名詞逐漸為社會大眾熟悉並使用。次年該會出版《山外山》雜誌，報導過去因石門水庫興建而被迫遷居的泰雅族人，開墾出的農地卻被高銀鑛化學公司排放的「鑛」污染，原先因水庫興建而遷移至此的泰雅人不但被禁止耕作，健康亦受傷害，再度被遺棄，<sup>16</sup>暴露山地平地化政策中，少數族群受壓迫的生存權問題；而居住在蘭嶼的達悟人則面臨著「美麗的蘭嶼島已成為核能廢料的『永久性墳場』」<sup>17</sup>，永久性生存於恐懼與威脅。同年海山本坑煤礦災變中有72個人罹難，當中38人是原住民比例高達53%，此外海山礦廠八百多位礦工中，原住民便佔五百餘位，<sup>18</sup>然而在各大媒體中往往忽視原住民在社會、經濟不公的境遇，使得原為「山地人」卻淪為「地底人」。隨之《人間》雜誌對湯英伸事件<sup>19</sup>的系列報導，披露原、漢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中，在優勢的漢文化社會體制中的社會公義之矛盾，同時再度製造了另一個「吳鳳的故事」，實則反映出原住民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上，在台灣社會中的困境。

1987年3月南投縣為因應玉山國家公園設置，發展「東埔風景區，觀光旅社區」，縣政府與鄉公所卻將布農族人從日人統治時期以來，一直使用的信義鄉第二號公墓廢止和遷葬，過程中部份未腐化的屍體任由其曝曬在外數日之久，《山外山》雜誌的「焦點透視」中，以〈還我祖墳！還我家園！--爭取我們「慎終追遠的權利」〉，並自許其為「全世界最慎終追遠的民族」<sup>20</sup>，對素來強調慎終追遠、緬懷先人的統治者漢文化而言，無異是一大諷刺。

1987年台灣政府解嚴並開放報禁，新興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首都

<sup>16</sup> 〈泰雅族同胞為「鑛」污染所苦〉，《山外山月刊》1，1985.7，頁4。

<sup>17</sup> 〈美麗島？核廢島？--一位雅美青年的控訴〉，《山外山月刊》1，1985.7，頁11。

<sup>18</sup> 《山外山月刊》1，1985.7.15。

<sup>19</sup> 1986年，就讀嘉義師專，18歲的阿里山青年湯英伸，因師院管教風紀問題而到臺北洗衣店打工，因遭欺壓和歧視，怒而殺害僱主一家三口，遭判死刑。

<sup>20</sup> 路索拉滿·阿勒，〈還我祖墳！還我家園！--爭取我們「慎終追遠的權利」〉，《山外山》1，1985.7。

早報、環球日報、台灣時報等，由於出自民間辦報，將長期以來社會的壓抑、衝突與矛盾關係揭露，同時在各報的副刊中出現原住民發聲的園地，卑南族的孫大川、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都是這些報紙副刊中的重要原住民海文化傳播要角，他們用筆耕耘，對社會大眾娓娓道來屬於他們獨特的文化傳統，他們的生花妙筆也有如一把尖刀，刺穿了當權者或是長期壟斷文化解釋權的誤解與固陋觀點，當然他們的觀點也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動。

除了日報外，80年代原住民自創的刊物有：《高山青》、《蘭嶼雙週刊》、《原住民》、《莊敬山脈》、《山外山》、《北曹》、《鄒》、《原報》，在80年代的原住民自創傳播媒介中從無到有，反映出少數民族自力救濟的成果，儘管這些刊物除了《蘭嶼雙週刊》外，大部分發行時間長則六年（《高山青》）、短僅一期（《山外山》），這些刊物主要針對社會上的族群關係中公義原則，與以針貶，並將少數民族被扭曲的或被框架的社會文化重新解釋，但其結果由於經費不足，以及與官方對立的民間立場，再加上缺乏企業主的支持，即便是1989年訴求部落文化體系重建，以尋回臺灣歷史的真貌、重建原住民族的尊嚴，開創臺灣多元的文化為其創報理念而創刊的《原報》，也僅以二十四期的發行量告終，而台邦·撒沙勒提出的「部落主義運動」，為實踐「原住民自治區」等政治任務致力發展經營部落的實力，進而關心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問題的努力，顯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僅擔任階段性任務。

而此間台灣各大報刊對原住民的報導，報導數量最多者多集中在衝突性事件；根據王嵩音從量化分析1988年到1995年之間，八年裡共168則原住民新聞指出：1988年的報導為數最多，計93篇，佔55.4%。主要來自原住民於1988年首次舉行大規模的還我土地運動，其次是1989年則有34篇（佔20.2%），顯示了媒體在新聞價值的選擇傾向衝突性的事件，有了抗爭的發生才可能受到媒體較大的注意。<sup>21</sup>抗爭與衝突的形式也是社會取得未來的平衡

---

<sup>21</sup>王嵩音，〈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之媒體再現〉，《淡江人文社會學刊》，2期，1998，

的重要過程。

無論從報導量的增加抑或是少數民族刊物的成長量觀察，在80年代的台灣文化的傳播方式，都有關鍵性的突破，雖是一個混沌的過渡期，但在衝突後才有產生抗衡或均勢的可能，社會大眾可以藉由有別於漢人報導山地人的方式，原住民創辦的刊物中建立了解原住民社會文化體系的管道，從而進一步落實民主社會的「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基本原則。

#### 四、結論

80年代台灣社會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環保運動，然而幾場天災人或下來，漢人的生活態度面臨嚴峻的考驗，漢人認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台灣四面環海、三分之二為山林覆蓋，但由於傳統農業社會經驗的包袱，加上傳統價值「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使得山、海文化與平地文化產生對立，山地平地化政策的結果更分化族群、矮化與壓迫了少數民族，讓主權在民的人民以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不僅未獲得保障，也造成憲法賦予各民族間一律平等的實際矛盾，導致台灣原住民族在長期的報導不公中，覺醒了誰拿麥克風誰有發言權，避免長期受壓迫於是從建立族群認同與自信上，發行刊物以為自己的民族發聲，取得文化解釋權，也避免溝通行為中的誤解產生。

政府常說：「我們都是一家人」，但是台灣是個多元社會（pluralistic society）在「一」與「多」之間，既是鄉親土親一家親的台灣人，卻又由於每個人身負為不同族群的成員身份，形成一新多元的想像，「選擇還是有的，方向還是敞開的，新的結果尚待發現。人類彼此都能滿意的生活型態，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義的權力體系中實現。」<sup>22</sup>凡此種種都需要未來的新作為，建立於傳播文化中的包容性與開闊性原則。

---

頁75。

<sup>22</sup>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台北：立緒文化，2004），頁317。

